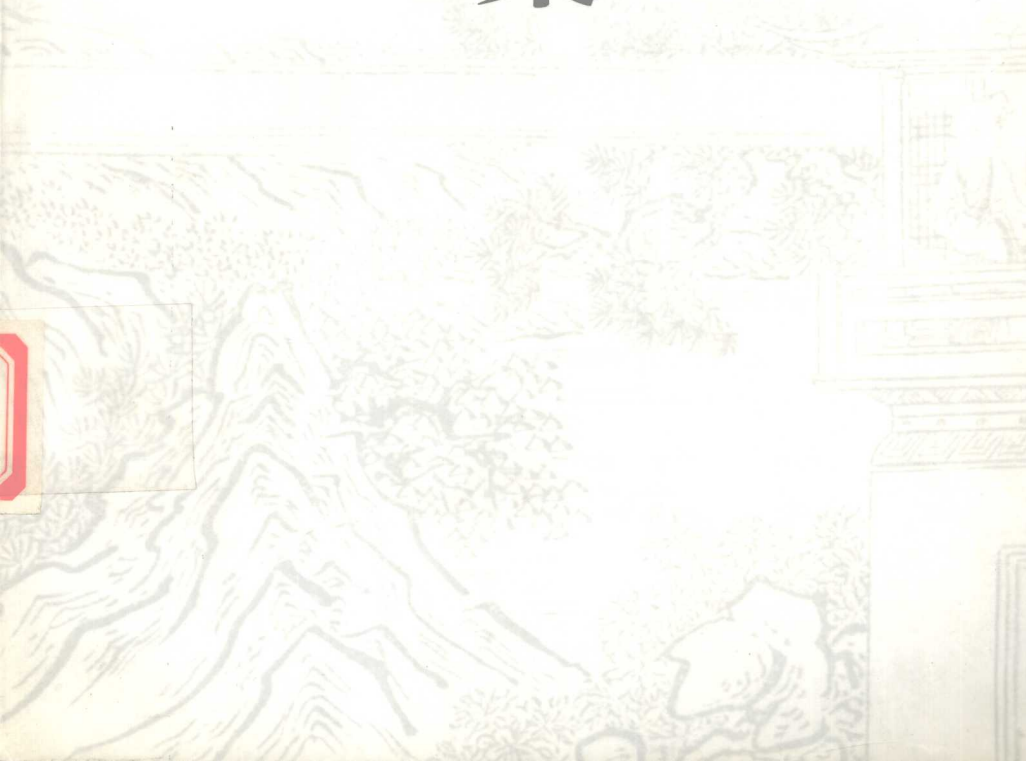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清〕廖 燕 著

二十七松堂文集

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



[清]廖燕 著
屠友祥 校注

二十七松堂文集

3 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二十七松堂文集

(清)廖燕 著

屠友祥 校注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 4 千字 373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7-80613-644-4/1·287 定价: 25.00 元

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缘起

小

品之作，文辞简峭，然又随意写去，萧萧数笔，情致毕现。这般冲口信手的笔姿，宜于将片刻间的心意发露，其内涵包纳周遍，述学，谈艺，衡文，论道，酒蔬亭池，竹头木屑，无所不及，故不尽。不尽，遂不休无已，为祛此弊，故知止。知止则简，简则通道。一一简，必有缺处，然彼有与此无触类相生，互为应答，显缺实则隐备。涉于繁，出以简，大抵是小品的本貌。至于文集的丛出，则始于宋。继之而发展，创出新句式来，便是晚明。至清，不衰。为使此类作品易于觅读，今取其五十种，汇为十辑，加以校注。注释殊非易事。清人阮葵生于《茶余客话》述及此道，曰：注释者，诗文之冷锤也。锻者于刀剑既成之后，细密加锤，曰冷锤。精铁得此，愈见坚利，毛铁则破碎。诗文注释，有意则精彩倍见，无意则罅漏多端。陈继儒则谓注书落剽窃则肤，落训诂则俗，复之有正笺，有旁书，不即不离，乍前乍却，颇似刘孝标注《世说》，陆农师注《埤雅》。两位所言，自是有味，令人欲依循一番，然而做起来总归是佳处难及，恶处不免。这套丛书，内中多有未经前人

注过者,倘有错失,惟望读者巨眼洞察,予以表出,方好。

编 者

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

校注二十七松堂文集小引

屠友祥

廖燕的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，清隽刚健，文奇思绝，为清初思想界的一件代表作，廖氏自然也是清文的一大家，然罕为人道及，其著作现已成稀覯之物了。这次乘编纂丛书的机会，将其整理印行，供酷嗜异端者，痛读快赏。

鲁迅把杂文用作匕首，投枪。这一观念及用法或即源自廖燕。就古文小品，人们大抵视之为几案间的小摆设。廖燕一扫这种俗见，以为古文小品之可尚，不在于它的短小，而在于这短小是长大的枢纽和缩藏，一如人的精神，缩于寸眸之内。也如他的名字燕，燕是小鸟，古燕字从鸟从乙，而駝则为得天地巨灵者。廖燕继又一气以六譬喻来衍说，道：巍巍泰岱，碎而为嶙峋沙砾，则瘦漏透皱见矣；滔滔黄河，促而为川渚溪涧，则清涟潏潏见矣；盖物之散者多漫，而聚者常敛，照乘粒珠耳，而烛物更远，予取其远而已；匕首寸铁耳，而刺人尤透，予取其透而已；大狮搏象用全力，搏兔亦用全力，小不可忽也；粤西有修蛇，蜈蚣能制之，短不可轻也。《逃古文小品序》既已将长大收纳于短小之内，则必有不可尽不可解之处。廖燕以为文莫佳于不可解而只觉其妙，短文尤

甚。古今文章，自千百字以至一二字，如题额命名之类，愈短愈难。此一二字，便抵过一篇大文。不可解胜于可解也，尽与不尽之分耳。（《与谭缪人》）

廖燕为文，无论何事何题，时时取以自况，所谓笔代舌，墨代泪，字代语言，笺纸代影照，以我告我，文因此而成，故一部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，可以看作是廖燕生命的记录，生气踊跃，充沛天矫，纯从自身性情中流出，一无依傍。他道古文时文之分，在于前者先有文章，偶借一个题目而述出，后者则先有题目，始寻文章，其间的区别，犹一有悲借泪以出之，一有泪而始悲。因而为文须有得于中，见出理，体得道，方可措之于辞。而天地间万物，在在处处，无一不是文，都是一部无字书，各人随自身的性情，与它们不期相遭，中有所触，舒之于词，遂成一家言。即便不以言辞的面貌出现，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于市，歌词虽不传，廖燕也以为二人方当酣饮涕泣之际，淋漓激宕，即此便是绝妙歌词，未必要著之于笔。如此，代代相传的典籍并不尽是理的载体。孙武、吴起因善行兵而著兵书，并不是因多著兵书而始善行兵。廖燕的一个创见，便是以为天地实作六经。凡日月星辰之灿列，风雨雷电之震惊，与夫山川草木禽鱼之巨细灵蠢，昭著于上天下地，莫非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之文之所变现。虽无字迹之可指，而六经之理，自具于未有文字之先。特天地不言，不得不寄其权于孔子而代为称述之，故曰述而不作。（《春秋厄言序》）另一方面，孔子之类虽为代言者，而其本身胸中必已将天地古今人物之变囊括殆尽，偶借一书以发之耳。孔子删述六经，无六经则不能见孔子。然使其不删述六经，必别有以见孔子者。（《草亭诗集序》）

天地山川既为无字至文，可经思而猎取之。而这思又须广游博览，太史公足迹遍天下，所历名山巨川，通都大邑，与夫人民风俗之怪奇纷赜，已成一部《史记》于胸中。（《复翁源张泰亭明府书》）因

而著书不可不远游，所以如此，在于文用以发舒幽愤之气。然天下之最能愤者，莫如山水。山则巉峭崿崿，婉孌磅礴。其高之最者，则拔地插天，日月为之亏蔽，虽猿鸟莫得而逾。水则汪洋巨浸，波怒涛飞，顷刻数十百里，甚至溃决奔放，蛟龙出没其间，夷城郭宫室而不可阻遏，故山水为天地之愤气所结撰而成。天地未辟，此气常蕴于中。迨蕴蓄既久，一旦奋迅而发，必极天下之岳峙潮回、海涵地负之观，而后得以尽其怪奇。其气之愤见于山水者如是，虽历今千百年，充塞宇宙，犹未知其所底止。故愤气为天地之才，非才无以泄其愤，非愤无以成其才。则山水者，岂非吾人所当收罗于胸中而为怪奇之文章者哉。（《刘五原诗集序》）此收罗之功，即是思。取天地古今与人情物理之所以然，熟思之，忽焉有得于中，于是发而为言语文章。（《八卦炉记》）

正是循着这样的理路，廖燕在种种烂熟的说法中思出别样的意义来。譬如《鲁论语·泰伯篇》述及武王之言曰：予有乱臣十人。一般解乱为治。廖燕则反问道，治也可以解作乱么？武王为什么不说治臣而说乱臣呢？这样一个词的有意误解或曲解，实际上触及了后人讳言先贤过失的传统，而当事人倒并不加以遮掩，廖燕以为这恰恰是武王之所以为武王的原因了。武王自称有乱臣十人，一如汤陈言“惟有惭德，恐后世以台为口实”，不讳言自身的篡弑之行。汤征桀而放之，武王伐纣而诛之，虽为伐暴救民的堂堂正正之举，而叛乱篡弑的实质也是不容讳言的。所谓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只是讲其篡弑顺天应人而已。因为若是天欲其为君，而终守臣节，则不得为君。不得为君，而何以为顺天？人愿其为君，而不敢放伐，则不能为君。不能为君，而何以为应人？故欲顺天应人，则不得不出于篡弑。廖燕的结论是，汤武之功，恰是汤武之过成之。有汤武之为君，虽篡弑可勿论。经这样的廓清之功，对统治者依武力而获取更替的行动，确立了一个

是非标准。然而就帝王之统来说，却是论位不论德。统是基绪之称，拥有天下，即是正统，不在于其得天下之正与不正。廖燕就此以三统来畅说，一是天下统一的一统，如唐虞夏商周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。一是天下分裂的正统和偏统，天下分裂，以承一统之正朔某朝为正统，余皆为偏统，如蜀汉与前五代后五代为正统，正统得，偏统也就可知了。正偏并不含褒贬之义。这有利于客观地说明种种历史状况。同样，孟子所谓以德行仁者王，以力假仁者霸，廖燕也以为只是涉及常则而已。究其实，天子称王，诸侯称霸，只是爵位尊卑的通号而已，假仁与行仁同人相关，同爵位无干。孔子说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其意就在于齐桓公能率诸侯而尊周天子，譬如一家长子统率其他诸子然。长子称伯，霸亦犹伯，其义取于长，而不是取于仁不仁。廖燕的这种历史观念，与占统治地位的融入名教思想的历史观念有着很大的距离。

廖燕就此作出的论断，依旧是循名责实的正名方法的运用，试图复原事物的本初意义，抹去后人添附上去的或是已经变质了的观念。这样的辨析，自然是对固有观念的冲击，况且廖燕的思索涉及到了传统生活的诸多方面，可见他将一切事物都置于重新理解的层面上了。如顺德李氏六女遇乱捐躯，为天地间轰轰烈烈之事，而俗讳其烈，独称其为贞。贞含女子未嫁守正之义，廖燕据此反问道：难道天地之大，就没有别人像六女般守正吗？如果说人人皆贞，而独以此名来称这六女，就涉于私而不是公论了。如果说只有六女守正，则是明为六女阐幽表扬，实即暗加众闺媛以不贞之名。一字不当，遂掩其捐躯之实，且因而诬及诸闾。廖燕实际上揭出了讳言烈的原由，因为捐躯殉难人们认为属男子之事，而女子为之，却不约而同地想到守贞。社会的一般观念通常是这样定型了的。世俗对功名的看法也是如此。康熙三十

八年，学使按韶，时廖燕五十六岁，赋诗一章，辞去诸生。客有谓其辞却功名者，廖燕作《辞诸生说》一篇，道辞诸生非辞功名，功盖天下曰功，名传万世曰名，诸生仅为四民之一而已，即便擢上第，历大官，称王侯将相，这些也只是朝廷爵禄，不是功名。爵禄出自朝廷，功名则由己立。辞诸生，正是为了不被其所限所误，专心于著述，因而可说自身是最热心于功名了。他对《战国策》一书“文章即事功，事功即文章，文可为武，武可为文，无异途错出之分”（《书战国策后》）深为赏叹，看来他对自身道途的抉择是有所自的。

与成举人中进士算不得功名这看法相类，廖燕以为攻制义，只能称作读八股，算不得读书。所谓时艺，正谓其为艺仅可验于一时。就八股取士，廖燕大发妙论，以为此法巧于秦始皇焚书。焚书使人无书可读，八股取士使人有书而不肯读，《明太祖论》就此展开的观念的分析，在封建时代可谓卓特横绝，透露了廖燕特具的直指根本的观察方法，极为典型，大可揣摩一番。它道：“天下可智不可愚，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。……扰天下者，皆具智勇凶杰卓越之材。使其有才而不得展，则必溃裂四出，小者为盗，大者谋逆，自古已然矣。惟圣人知其然，而惟以术愚之，使天下皆安于吾术，虽极智勇凶杰之辈，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。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，与秦焚书之术无异，特明巧而秦拙耳，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。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，欲传之万世，以为乱天下者，皆智谋之士，而欲愚之而不得其术，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，于是焚之以绝其源。其术未尝不善也，而不知所以用其术，不数年而天下已亡。天下皆咎其术之不善，不知非术之过也，且彼（谓秦始皇）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。诗书者，为聪明才辨之所自出，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辨之具。况吾（指明太祖）有爵禄以持其后。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，

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，不知为法所愚。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，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，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，明太祖是也。……明制：士惟习《四子书》，兼通一经。试以八股，号为制义。中式者录之。士以为爵禄所在，日夜竭精敝神，以攻其业。自《四书》、一经外，咸束高阁。虽图史满前，皆不暇目，以为妨吾之所为。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。非焚也，人不复读，与焚无异也。……书不可焚，亦不必焚。彼汉高、楚项所读何书？而行兵举事，俱可为万世法。诗书岂教人智者哉，亦人之智可为诗书耳。使人无所耗其聪明，虽无一字可读，而人心之诗书原自不泯。且人之情，图史满前，则目饱而心足。而无书可读，则日事其智巧，故其为计更深，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也，秦之事可鉴已。”以诗书愚士子，日腐其心，耗其聪明，使读书人本应具备的浩然之气扫荡无馀。廖燕《书战国策后》对彼书文章与事功不分这千古独绝的性状，溯其所致而然的缘由，以为是气足之故。战国之士，俊伟瑰琦，以一布衣揖让人主之前，折冲俎豆之上，抵掌而谈天下之事，发为文章，出于己意之以为诚然者，无言浮于其意之蔽。而八股取士，为堵作弊之隙，绳检防范，至为严酷，使士子皆囚首垢面，以应朝廷之举措，关于这点，收入本丛书的《味水轩日记》与《游居柿录》都有记述。廖燕就此除辞却诸生之类举动外，一再从根本上来立说，以为天下只我一人，其余的都是我的现相，望借此来恢复士气，《三才说》一篇，就是说这个我的。他认为天地人无大小寿夭之分，不必叹人而羨天地，因为我生天地始生，我死天地亦死，天地附于我而显现出来。天地既已如此，则其余一切当然也不例外。即就读书而论，也应假纸上的陈言，詮我胸中的妙理，孔孟也不过是我的借径，程朱更不在话下。这借径便是用来实现我之为我的，以我博古，即以古博我，熔铸既久，遂合天地、古今、人我为一人，廖燕以为这是天下最大的文章，由

此，遇则为国家有用之材，不遇则为岩穴知名之士。具备这种蓄养盈足的气，自然可为天下一切事，即便细若评文，经由发抒自家胸臆，以我的手眼，定他人的文章，使文章更开生面。也正是基于此，廖燕至为鄙薄和诗，就是因为这必以我性情之物，为供他人韵脚之用，步趋的结果，便是我不存在了，也就失却诗赖以生存的基底。在文集自序中，廖燕自谓书即是我告我，我即书，书即我，纯是自身真性情的发露。这一部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，究其实，就是一个廖燕在道说着天下万物，思想文章的奇异，无法据一端来范围它。这种道说的艰苦与愉悦，他在《作诗古文词说》中讲：“方搦管构思，不无惨淡经营之状，似亦有时而不乐者矣，及其得意疾书，便觉鬼神与通，造化在手，不难取天地宇宙山川人物区画而位置之。曾天地宇宙山川人物之大且繁，亦不得不默然拱听，退而就我之范围也。况此时我之为我，无父兄师友督责于其前，又无主司取舍荣辱之虑束缚于其后，惟取胸中之所得者沛然而尽抒之于文，行止自如，纵横任意，此其愉悦为何如者耶。”又，天地这部无字书，以穷幽极渺，来驰骋其怪奇倜傥之才，“然天地因好奇，尝留缺陷以待人之自效，使能出其智力，以补天地之缺陷，则其人遂可与造物同功。故古来圣贤英杰，皆补天地缺陷之人。人惟不能补缺陷之天地，遂为天地之所缺陷，非废人则庸人已耳。”（《募修清远峡路疏》）然而自用智力太过，一味自抒愤懑，以是其所非、非其所是而为快，未免现出偏仄之迹，尤其是在释论学术问题时，过于将对象作借径来用了，误处就不可避免，这在文集中时有遇及。于《与黄少涯》尺牋内，廖燕自辩道：“以燕之疏慵放诞，而下笔立论，尚肯效学究家区区诠释字义而已耶？必不然矣。”因而那种误处或是有意如此，也未可知。

此次校注，以日本柏悦堂文久二年（清同治元年，公元一八六二年）刻十六卷本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为底本，参校以复旦大学

藏二十二卷本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及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三年刻十八卷本《二十七松堂集》、民国十七年韶州风度路利民印务局刊印本。辑补入和刻本所缺文三十一篇及《四书私谈十八则》、《答客问五则》、《山居杂谈六十五则》，除文类相同者置入和刻本相关之卷末尾外，其余均收入附录一，都为相当重要的文章。另外，还有三种廖燕自述性的杂剧，收入附录三传记资料汇编内，激昂狂放，很可见出廖氏的自家面目来，应参看。

顾易生先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，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

刻二十七松堂集序

古今能文之士，非好奇也，所遭之境奇，则文亦从而奇焉耳。朱明之季，制义败才，奄竖败政，党祸败人，而闯贼、鞑虏遂败国矣。士生乎斯际，抱负器识而不得其位者，不能厘革敝制以养天下之才，不能诛逆奄以培国脉，不能扬明哲保身之训以矫僭妄诡激之病，不能麾三军之众以歼流贼骄虏，其忠肝义胆孤愤深慨之气，郁积磅礴，久而不泄，触境而为文辞以自意，若侯朝宗、魏冰叔、廖柴舟是已。读三子之文，考其所交游之士，一时草泽中，何其多奇材也。而又怪《明史》少传其人者。岂三子欲奇其文而张皇其人，华胜而实否与？将其人皆愤世嫉时，不欲见其奇，幽潜穷愁以死与？要之太史氏不传，而文士传之。明氏之多材，因以见于世，可谓文由境以奇，境亦由文以益奇矣哉。邵子湘有言：朝宗以气胜，冰叔以力胜。余则谓柴舟以才胜。盖明季之文，朝宗为先驱，冰叔为中坚，而柴舟为大殿矣。夫胜者所用，败者之棋也。兴国所用，亡国之臣也。以柴舟之才，鸣觉罗氏之盛，绰绰乎有馀。觉罗氏亦非不欲用之，而不肯为，独为湖漭泽湄娱忧抒愤之文，然则其所自意者，将有不堪自悲者焉。其文之尤奇，不亦宜

乎。侯、魏集，世多有，人人得而传诵之。而廖氏集舶载綦少，监察妻木君酷好之，将梓之以惠后学，嘱二本松儒、员山田士文校正，微予序。予雅奇廖文为朱明三百年之殿也。于是乎言。

文久二年壬戌春二月

江门 盐谷世弘撰

序

岁庚午冬，予自珠江还客韶，闻此地有廖子柴舟，天下士也，因急访之。一见即惊其为人。及得读《二十七松堂集》而更有异焉。古今畸人伟士，莫不以诗文传，盖其人类多不得志于时，致其气之牢骚郁勃而无可告语，遂每藉诗与文，一泻其不平之气，而气遂为之平。故诗与文，莫不以气为主。惟有道以深之，而其诗与文遂为子史之副本，盛世之羽仪，岂偶然哉。予观柴舟之为人，卓立人表，豪气不除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大抵其诗与文之凌厉激宕如其人，其不平之气固然。然柴舟数十年至此，亦大异矣。昌黎云：物不得其平则鸣。然既已鸣之，则其气为已平。大江之源，始于岷山，延及洞庭、彭蠡诸大湖。予尝溯九江，抵天河，探积石、禹门之奇。禹门旁两山约束，水势严促紧逼，水之气不得其平，故湍激驰骤，即蛟龙无以杀其势。及其险阻既远，波涛不兴，则可泛舫而浴日月也。柴舟之诗与文，何以异是。不平则鸣，已鸣则无不平。数十年来，柴舟所历穷通常变荣辱，与夫辛苦流离忧虞险厄患难之故，无不备尝，不平之气激而为诗文，而诗与文即有以平其不平之气，盖深于道也久矣。故予以为柴舟之诗文，为圣

贤所欲言，而非仅畸人伟士之诗与文也。则子史之副本与盛世之羽仪，皆其自为之，岂世之是非毁誉所得而高下也哉。柴舟性磊落，高奇自负，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，所交游皆当世名流。少习举子业，未几弃去，欲以奇计取功名。其年欲上皇帝书，方出岭，以疟作而返，食贫著书垂二十年，至今不少衰。所著甚多，此集外，有别集、别记并诸选本，共若干卷，著述尚方兴未艾，其他异事，亦有不可胜记者。予独喜其怀有用之才，虽不得稍展其志，然曾不以贫贱富贵动其心，而又能著书立言，以相深于道。其气已无不平，为独异而可传也。嗟乎，予弹铗鼓瑟，落拓天涯，与柴舟之遇，曾不少异。然穷且益坚，予二人又焉知不为雷为霆以伸其浩然之气于古今天地之间也耶。庐陵同学弟朱萼拜撰。